国内外关于日本史学对中国近代三大史学思潮影响研究综述

杨 鹏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思政部,陕西 杨凌 712100)

摘要: 发轫于20世纪上半段的中国近代三大史学主潮:新史学思潮、疑古思潮、马克思主义史学都与日本的近代史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关于中国近代三大史学思潮中的日本影响因素这一课题,国内外学术界的已有相当的积累,体现了中日史学交流研究的深入与繁荣。然而当前研究仍存在一些薄弱环节,需要学者们潜心探索。

关键词: 新史学思潮;疑古思潮;马克思主义史学
中图分类号: K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79(2013)03-0095-06

An Overview of the Influence of Japanese Historiography on Three Major Historical Trends of Thought in Modern China

YANG Peng
(Institute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Northwest A&F University, Yangling, Shaanxi 712100, China)

Abstract: The three major historical trends of thought in modern China beginning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the new historical trends of thought, skepticism toward ancient historical trends of thought and Marxist historiography——have countless ties with the Japanese historiography. The domestic and foreign academic circles have accumulated a lot of research results about factors of the Japanese influencing three Chinese major historical trends of thought, and the academic exchanges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reflect the depth and prosperity of historical study. However, there are still some weak links in the current researches for the scholars to deal with greater concentration.

Key words: new historical trends of thought; skepticism toward ancient historical trends of thought; Marxist historiography

中国近代史学改革一直走着"步武日本"与"规仿泰西"两条路,而日本史学对中国近代史学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其中,中国近代史学的三大思潮即新史学思潮、新历史考据学思潮、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潮的兴起、发展均接受了大量的日本史学的观念、方法及其研究结果,而这一接受过程中必然会对日本史学有所选择、吸收、借鉴,以至内化成中国史学自己的阐释。关于中国近代三大史学思潮中的日本影

收稿日期: 2012-12-01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青年基金项目"中国近代史学兴起发展中的日本影响因素研究"(项目编号:12YJC770063)
作者简介: 杨 鹏(1982-),男,山东济南人,历史学博士,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思政部讲师。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史。

响因素这一课题,国内外学术界的已有相当的积累,本文试对国内外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综述并作简要评析。

一、大陆及港台的相关研究

(一)90 年代以前的相关研究

较早关注近代日本史学对中国史学影响是台湾学者杜维运,他的《西方史学输入中国考》、《西方史学心目中的中国史学》、《梁启超著 < 中国历史研究法 > 探源》等论文以及《与西方史学论中国史学》一书的《中西史学的交流》一章对中西史学交流进行了论述。杜先生在《西方史学输入中国考》(收录在《与西方史家论中国史学》,见《食货月刊》第 1 卷第 2 期,1971 年 5 月)一文中提到,对于 20 世纪初的梁启超,他当时所了解的西方史学极为有限,他没有直接阅读西文书籍的能力,仅能从日文书籍晓得一些西方史学。这种说法使我们明确梁早期的史学思想确实来自日本,但杜文没有进一步探究梁氏从哪些日文书籍中获取了哪些西方史学资源。

20 世纪 80 年代,大陆的学者开始关注这一问题,俞旦初是最早研究该问题的学者。1982 年至 1983 他在《史学史研究》上发表长篇论文《二十世纪初年中国的新史学初考》。该文从 20 世纪初的各类旧期刊、翻译史著和清季历史教科书中爬梳出大量的史料,其意义不仅在于十分具体地为人们勾勒出了"新史学"思潮的总体概貌,还在于对西方史学东传的第一次高潮作了开拓性的研究。对于西方史学理论的借径日本输入中国的问题,俞文主要讨论浮田和民的《史学原论》和坪井马九三的《史学研究法》中译文的出版、流传及影响。俞文虽然对《史学原论》各种中译本作了整理,但令人遗憾的是,他没有进一步探究《史学原论》与梁启超《新史学》的关系。1984 年胡逢祥发表《二十世纪初日本近代史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学术月刊》第 9 期)一文,全面梳理了 20 世纪初至"五四"时期日本史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在提到浮田和民《史学原论》与梁启超《新史学》的关系时,胡文明确指出《史学原论》中不少论述几乎全部为梁启超《新史学》所取,文中只引了一小段文字,又加注释说"因原文太长,无法引录,读者自可寻原书对照。"这一条关键性的提示,启发了史学研究者。此外,梁启超的新史学思想受日本文明史学的影响也很大,胡文中探索了日本文明史著作在 20 世纪初中国的译介与传播情况,认为:"随着其时资产阶级新史学的兴起,探索历史因果律日益越来越多的人肯定为历史研究的基本目的,这种进步史学思想之能在较短时期内产生较大的影响,日本文明史学在国内的传播无疑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肯定了文明史学对新史学思潮形成所起的积极作用。但胡文也未能说明文明史学对梁及新史学思潮的影响程度。

此外,有关发生于 20 世纪前期的日本疑古思潮与中国古史辨运动的相互关系这一具体问题,徐旭生、胡秋原分别于 1960 年、1973 年发文指出顾颉刚受到白鸟库吉的"尧舜抹杀论"的影响,他们并未有真实证据,大致是依据 1909 年 8 月,白鸟库吉提出"尧舜抹杀论",1921 年 3 月至 1922 年 2 月间,内藤湖南响应白鸟而提出"加上原则"。1923 年 5 月,顾颉刚发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这一时间落差而推论为有"可能性",又将此可能性作为事实而发表了许多与那个时代相适应的政治攻击性的言论。

(二)90 年代后的研究论著

1. 著作方面,1990 年代以来,胡逢祥、张文建的《中国近代史学思潮与流派》对此论题有所关注,胡著选取新的视角,从纷纭复杂的史学现象中抽绎出经世致用、新史学、国粹主义、西北史地研究、古史辨、新考据学、马克思主义史学等思潮与学派进行系统阐述,通过把握近代史学的变迁大势,揭示其规律与特点。其中对新史学与日本史学的关联以及唯物史观的经由日本传播至中国的情况作了提纲挈领式的论述。桑兵《国学与汉学:近代中外学界交往录》(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 年)较为全面的梳理了 20 世纪中国学术界与西方(包括日本)汉学界之间的交往,并就上世纪初日本和中国学术界之间互动作了较为系统的研究,而且作者特别论述了中日在蒙元史、甲骨文、敦煌文书、汉籍方面的交流情况,指明从 19 世纪 90 年代起,随着东洋史学的建立、东京东洋学派和京都学派的形成发展,在帝国大学扩建、东方主

义兴盛以及日本政府推行大陆政策的交互作用下，日本的东亚研究阵容迅速扩大，与中国学术联系得到加强，这必然影响了中国的学术特别是史学的改变。郑匡民的《梁启超启蒙思想的东学背景》（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 年）围绕梁启超启蒙思想这个主题，论述了有关当时日本诸思潮，解读梁从明治日本诸思想以及由它们所介绍和导入的欧洲思想中接受的理论进行研究，书中发掘了部分日文史料，虽很少直接涉及梁启超新史学的探讨，但对梁启超新史学的日本渊源问题，仍有一定的启发意义。李孝迁《西方史学在中国的传播（1882－1949）》从清季汉译历史教科书、20 世纪初文明史学之东传、西方史学理论的初期引介、梁启超新史学思想之考源、鲁滨逊新史学派在中国的回响、斯宾格勒在中国、兰克史学与中国现代史学等 7 个方面，对西方史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作了深入的探析。在讨论梁启超新史学思想之考源时，作者运用对勘比较的方法，将《中国史叙论》、《新史学》与各种译著、日文本、作细致的文本比对、解读，使我们对梁启超如何构成有了一个较为全面的认识。但书中也有遗憾之处，即未将马克思主义史学列为研究对象，对此作者做出了解释 “马克思主义史学（或唯物史观）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原应纳入本课题的研究计划，不过考虑到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的特殊地位，而且对我国史学发展影响至大，有必要作独立的研究，故本书不涉及这方面的讨论。”张广智主编的《20 世纪中外史学交流》（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年）重点考察了 20 世纪中外史学交流之行程，并选择最具代表性的历史学家与历史学派作为个案（梁启超、兰克学派），从一个侧面细化 20 世纪中外史学交流发展史。

除上述论著，还有的著作侧重对中日近代史学自身的考察。其中包括一些专门研究国外汉学和日本中国学的著作，如严绍盪《日本中国学史（第一卷）》（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 年），葛兆光《域外中国学十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 年），李庆《日本汉学史Ⅰ：起源与确立》（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 年）、《日本汉学史Ⅱ：成熟和迷途（1919－1945）》（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 年）、《日本汉学史Ⅲ：转折和发展（1945－1971）》（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 年），钱婉约《内藤湖南研究》（中华书局，2004 年），李萍《津田左右吉研究》（中华书局，2004 年），钱婉约《从汉学到中国学：近代日本的中国研究》（中华书局，2007 年），王向远《日本对中国的文化侵略——学者、文化人的侵略战争》（北京昆仑出版社，2007 年）等。或以史学流派为主线探讨中国近代史学的论著，如候云灏《20 世纪中国史学思潮与变革》（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年）、张书学《中国现代史学思潮研究》（湖南教育出版，1998 年），陈其泰《20 世纪中国历史考证学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年），田旭东《二十世纪中国古史研究主要思潮概论》（中华书局，2003 年），吴少珉、赵金昭主编《二十世纪疑古思潮》（学苑出版社，2003 年），桂遵义《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 年）、张剑平《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等，值得一提的冯天瑜的《新语探源：中西日文化互动与近代汉字术语生成》从“新语”生成和使用的角度对中西文化间的差异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书中后半部分着重剖析汉语、英语、日语之间的变化与互动，并从宏观上将三者之间的关联做出提炼性的分析，亦列举丰富的实例予以佐证。这些中日学者的著作多以叙述史学发展的脉络为主，而对中日近代史学的沟通缺乏有意义的探索。

2. 论文方面，中国史学界对梁启超新史学思想的日本渊源研究又有新的突破，蒋俊的《梁启超早期史学思想与浮田和民的＜史学通论＞》（《文史哲》，1993 年第 5 期）、尚小明的《论浮田和民＜史学通论＞与梁启超新史学思想的关系》（《史学月刊》2003 年第 5 期）、邬国义的《梁启超新史学思想探源》（《社会科学》，2006 年第 2 期）等文则从文本比较的细致层面，探讨梁启超新史学思想与日本学术资源的关系。王晴佳《中国近代“新史学”的日本背景——清末的“史学革命”和日本的“文明史学”》（《台大历史学报》第 32 期，2003 年）厘清了清末“史界革命”与日本“文明史学”的联系，并经研究后提出了与许多学者不同的意见：梁启超在 1902 年发表的《新史学》虽然借鉴了浮田和民的《史学通论》，但两书其实有很大区别。梁启超的《新史学》，还是受福泽谕吉《文明论之概略》的影响为多。像日本的文明史家一样，梁启超在《新史学》中，号召“史界革命”，主张历史的写作应以描述民族的进化和社会的进步为中心。今人分辨梁氏史学思想渊源，不难发现其对日本著作多有借鉴，但他们还同时指出：梁文虽有所本，

但又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加以改造、发挥——晚清学者并不忌讳“借鉴”,关键在于是否“合用”。比如,对传统中国史学“四弊二病”的批判,便属于梁启超的自家心得。

中日近代教科书关于近代中日历史教科书交流问题也引起了学者们的兴趣,董说平《晚清时期日文史书在中国的翻译与传播》(北京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4 年)通过对中译日文史书、翻译人员与机构、翻译活动涉及的地区等情况进行研究,揭示出晚清时期日文史书在中国的翻译活动有三个特点:(1)日文史书中译活动在时间上存在不稳定性;(2)日文史书中译活动在各地区发展的不平衡性;(3)中国翻译人员在日文史书的翻译活动中存在偏重性。李孝迁《清季支那史、东洋史教科书介译初探》(《史学月刊》,2003 年第 9 期)考察了清季对日本之支那史、东洋史教科书的引进、翻译、出版和流传的过程,着重分析了这些日本中国史教科书对于清末新式学堂的历史教育、国人自编的国史教科书乃至晚清新史学观念的形成所产生的影响,肯定了这类教科书在中国近代教育史和史学史上的一席之位,对于晚清历史教科书中的爱国主义思想多有阐发。李孝迁、林旦旦《清季日本文明史作品的译介与回应》(《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 年第 3 期)对清末译自日人的文明史作品的出版、流传及影响,作一粗略的考察,指明近代中国人自己编写的历史教科书或多或少都留有日本式文明史的痕迹。甚至到了民国初年,仍有学人强调本国历史教授应采用“传记体”和“开化史体”。民国期间以及建国后所出现的一些通史,我们还可以发现日本式文明史的影子。

还有一些论文是针对日本近代中国学中的“毒素”加以批判的,如王向远《近代东洋史、支那史研究中的侵华图谋——以内藤湖南的<支那论>、<新支那论>为中心》(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 年第 1 期)和《日本对华侵略与所谓“支那国民性研究”》(《江海学刊》,2006 年第 3 期),龚咏梅《试论近现代日本中国学与日本侵华政策的关系》(《湖南社会科学》,2001 年第 1 期),解学诗《从史学博士白鸟库吉到右翼狂人大川周明》(《社会科学战线》,2003 年第 3 期)等。批判日本侵略中国论文甚多,但紧扣“日本近代中国学(包括历史研究)”范围的文章还很少见。

关于新历史考证学与日本史学的关联和日本实证主义史学的输入。王晴佳《考据学的兴衰与中日史学近代化的异同》(《史学理论研究》,2006 年第 1 期)从儒家学术传统的变迁出发,考察考据在明清两代的兴起和发展,及其在德川日本的影响,从比较的角度,检讨中日两国近代史学的传统资源及其不同之影响。作者认为:考据的方法作为一学术思潮在明清交替之后盛行,则与明代王学之泛滥和清代的统治有关。这一思潮到了 19 世纪,在中国已呈衰颓之势时传入日本,逐渐主导了日本儒学和整个学术风气。十九世纪中叶以后,日本史学开始迈入近代化,其特征是一方面吸收西方“文明史学”,另一方面又因考据学的兴趣而对德国的兰克史学情有独钟。考据学在清末的衰落和今文经派的兴盛,也直接影响了中国史学的近代化。由于考据学兴衰在中日两国的“时间差”,使得两国的近代学术呈现出重要之不同。王文着重探讨了中日史学从传统到近代的转型期中考据学的不同,并进而讨论中日近代学术发展的不同轨迹及其原因。但未能从日本实证主义史学对中国新历史考证史学的影响方面作进一步的讨论。易兰《兰克史学之东传及其中国回响》(《学术月刊》,2005 年第 2 期)、李孝迁《中文世界中的兰克形象》(《东南学术》,2006 年第 3 期)二文阐释了兰克史学的贡献、理清其东传的路径、揭示其在中国史学界的回响,对经过日本过滤而来的兰克学派及其形象进行了细致的考察。

中日疑古史学的相关性问题仍是学界关注的焦点。1992 年,李学勤在有关文章中亦指出“疑古思潮从起源上说,可追溯到上世纪末,也就是晚清的时候。……实际上,这种疑古的思想不仅在中国出现,差不多在同样的时间,日本和欧洲也都有人对中国的古史表示怀疑。他们的见解,对中国学者也有或多或少的影响。到了辛亥革命以后,疑古思潮在中外都有进一步的发展。”接着举白鸟库吉“尧舜抹杀论”为例,暗示集疑古辨伪之大成的顾颉刚也受到了日本人的影响。1999 年,钱婉约发表《“层累地造成说”与“加上原则”——中日近代史学上之古史辨伪理论》(冯天瑜主编《人文论丛》(1999 年卷),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 年)一文,对中日两个邻邦在差不多同时形成的古史辨伪理论进行了比较研究,她深入日文原著,从内容、形成时间、学术渊源等方面作了比较分析,并梳理出与此相关的日中两国近代辨伪史学

发展的真实面貌，探明清代乾嘉年间学者崔述无疑是内藤湖南中国史辨伪思想与顾颉刚“层累地造成说”的共同源头，并探讨了关于顾颉刚的“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说”与内藤湖南的“加上原则”这两个代表中日两国对于中国上古史辨伪实证研究的理论形态的内在联系。至于顾颉刚是否受到内藤湖南的影响，钱文并未下定论，只是说“这有趣的雷同是历史性的巧合，可以视为中日史学在脱离传统、迈向近代的过程中所必须经历的共同阶段，以及在此阶段上所表现出来的共同的文化学术现象。”李庆也曾撰文指出发生于上世纪初叶的日本疑古史学对中国学术界有很大的刺激，中国在二三十年代逐步形成的“疑古派”受其影响是很大的。比如，疑古派的代表人物顾颉刚提出的“大禹是条虫”的看法，实际上和白鸟库吉在他那篇著名的《支那古代传说之研究》中的说法，是完全一样的。究竟二者是否有所关联，顾颉刚的疑古观念是否受白鸟库吉、内藤湖南等日本学人的影响，目前学界尚无定论，值得深入探究。

关于日本思想界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影响研究的论文多集中于介绍日本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思潮及唯物史观在中国的传播情况。李坚、章军《日本还是俄国——论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主渠道》(沈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 年第 2 期)通过分析得出，本世纪初至俄国十月革命，中国人主要从日本得知马克思主义。十月革命以后至中共成立，日本仍是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主渠道。中国人主要借助日文了解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宣传者大多留学日本，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认识带有浓厚的日本色彩。史革新《唯物史观在我国早期的传播》(《史学史研究》,2002 年第 2 期)在比较充分地占有史料的基础上，就清末最后十年间(1901—1911)国人对唯物史观的初步介绍谈一些看法。对经由日本转道而来的唯物史观的传入内容、国人的反应等问题作了初步探讨。郑红娥《留日运动与社会主义思潮在中国的传播》(湖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1 年)分三部分:1. 西学东渐:社会主义思潮在日本。2. 社会主义思潮:从日本到中国。3. 留日运动对中国人接受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探讨了留日运动对中国思想界的转变即社会主义思潮的兴起所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巨大影响。门晓红《当代日本社会主义思潮》(中共中央党校研究生院博士学位论文,2005 年)介绍马克思主义在日本的传播、发展、影响及其深远意义，包括社会主义思想在日本的传播，自由民权运动，无产阶级队伍的壮大与工人运动，日本早期社会主义运动，日本共产党的创立和日本社会主义运动的高涨，日本社会主义思潮对日本社会的影响、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及马克思主义的贡献。

二、国外的相关研究

至于国外的相关研究，1960 年代以来，日本有代表性的相关研究主要有小泽荣一《近代日本史学史の研究・明治篇》(吉川弘文馆,1966 年)、坂本太郎《日本的修史与史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 年)、江上波夫《東洋學の系譜》(大修馆出版社,1992 年)、五井直弘《近代日本と东洋史学》(青木书店,1976 年)、松本三之介《明治思想における伝統と近代》(東京大学出版会,1996 年)、野村浩一《近代日本の中国认识——アジアへの航跡》(研文出版,1981 年)、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三联书社,1981 年),大久保利谦《日本近代史学の成立》(吉川弘文馆,1988 年),增田涉《西学东渐与中日文化交流》(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3 年)沟口雄三《日本人视野中的中国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 年),狭间直树《梁启超・明治日本・西方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共同研究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年)等，最新的则有旅日中国学者陶德民的《明治的汉学者と中国》(関西大学出版部,2007 年)等。值得一提的是坂本太郎《日本的修史与史学》和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日本的修史与史学》是一部相当于教科书的日本史学史读物，此书内容从日本最早的历史书《古史记》、《日本书纪》开始，包括奈良、平安时代国家编纂的史书，镰仓、南北朝、室町时代的历史物语和战记物语，以及基于佛教和神道立场的宗教史论等;江户时代幕府编纂的史书和儒学者、国学等的历史研究;近代、明治时代以后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各种历史书的编纂事业及历史学的成立与发展等，并通过对各时代有代表性的史书的作者、年代和特点，以及历史观和历史意识的考察，阐述了一部具有自身特色的日本史学史，坂本认为江户时代以前是历史叙述的发展阶段，到近代历史学才真正形成，并从这一观点通观

日本的史学史。这些日人著作多以叙述日本史学脉络为主,而对中日近代史学的沟通缺乏有意义的探索。实藤《中国人留学日本史》以大量第一手资料,包括留日学生的日记、书信、著译书刊、口述史料及中日文公私档案文牍,详述 1896 年至 1937 年间留学日本运动的缘起和演变,留日学生的学习、生活和政治活动,以及留日学生对中国近代思想、政治、教育、文学、语言、翻译、出版事业等方面的影响和贡献。国际学术界誉为研究 19 世纪末 20 世纪前叶中日文化关系(包括史学关系)的重要参考书之一。欧美学界也对中国史学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起源问题有所关注,美国历史学家德里克的《革命与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起源(1919 – 1937)》一书以 1920—1930 年代的"中国社会史论战"为中心,在现代中国思想发展的脉络下,对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的起源进行了深入的剖析,阐明了其时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中国历史时所面临的问题和困难,以及他们对其时中国的革命性大变革的专注是如何塑造了他们处理理论和历史问题的方式的。

综上所述,可以发现,中外学术界已有的研究尚存在一些问题:1. 一些论者或满足于资料罗列、事实比附;或多作宽泛的平行比较,深层联系开掘不够。2. 孤立地论述问题,视野受阻,对接受规律揭示不够。大多数相关论著只停留在探讨中日史学(思潮)自身发展过程,而忽略二者的关联与互动。3. 当前学术界侧重于探讨西方史学对中国史学的直接影响,对日本近代史学本身的作用缺乏足够的重视。4. 论题过于集中,如梁启超"新史学"与日本史学关系的研究成为多数论者兴趣所在,而许多重要的问题却无人问津,或仅作浮光掠影式的概说,深层联系开掘不够,同时也忽略了对日本在中国近代史学发展进程中的负面影响因素的分析。鉴于以上薄弱环节,更需要学者们潜心攻关研究,这也是今后中日史学(思潮)交流研究的重点。

参考文献:

[1] 杜维运. 西方史学输入中国考[J]. 台湾大学历史学系学报,1976,(3).
[2] 胡逢祥. 二十世纪初日本近代史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J]. 学术月刊,1984,(9).
[3] 桑 兵. 国学与汉学:近代中外学界交往录[M].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
[4] 徐旭生. 中国古代史的传说时代[M]. 北京:科学出版社,1960.
[5] 李孝迁. 西方史学在中国的传播(1882——1949)[M].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6] 陈平原. "元气淋漓"与"绝大文字"——梁启超及"史界革命"的另一面[J]. 文学评论,2003,(3).
[7] 王晴佳. 中国近代"新史学"的日本背景——清末的"史学革命"和日本的"文明史学"[J]. 台大历史学报,2003,(32).
[8] 李学勤. 走出疑古时代[J]. 中国文化,1992,(7).
[9] 钱婉约. "层累地造成说"与"加上原则"——中日近代史学上之古史辨伪理论[J]. 人文论丛(1999 年卷)[C].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
[10] 李 庆. 日本汉学史Ⅰ:起源与确立[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
[11] 董说平. 晚清时期日文史书在中国的翻译与传播[D]. 北京师范大学,2004.
[12] 李 坚,章 军. 日本还是俄国——论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主渠道[J]. 沈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2).
[13] 史革新. 唯物史观在我国早期的传播[J]. 史学史研究,2002,(2).
[14] 郑红娥. 留日运动与社会主义思潮在中国的传播[D]. 湖南师范大学,2001.
[15] 〔日〕实藤惠秀. 中国人留学日本史[M]. 谭汝谦、林启彦译. 上海:三联书店,1983.
[16] 〔日〕坂本太郎. 日本的修史和史学[M]. 沈仁安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
[17] 〔日〕小泽荣一. 近代日本史学史の研究·明治篇[M]. 东京:吉川弘文馆,1966.
[18] 〔日〕江上波夫. 東洋學の系譜[M]. 东京:大修馆出版社,1992.
[19] 〔美〕阿里夫·德里克. 革命与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起源(1919 – 1937)[M]. 翁贺凯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

(责任编辑:吴 赘)